

林淑华 著



生死恋

一句承诺，十年守候，一生追忆……

它超越了生命的长度、心灵的宽度、灵魂的深度



林淑华
著

生死 不忘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生死恋 / 林淑华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1.6

ISBN 978-7-5057-2866-0

I. ①生… II. ①林…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2865号

书名	生死恋
著者	林淑华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12.125印张 278千字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0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866-0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生死恋》劫后余生的故事（代序）

《生死恋》在1948年3月初版后，共印了5次。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和安慰，更增加了我向生命和命运搏斗的勇气。从那以后，我个人的生活方向和境况都开始有了较大的转变。

那时，上海已临近解放。国民党政府一败涂地，社会动荡不安。白色恐怖笼罩全市，消息严密封锁；世风日下，物价暴涨，人们处在水深火热、朝不保夕的困境中，幸而到了1949年5月，上海获得了解放。

上海的解放，带来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代不同了，社会环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面貌和生活条件也和过去截然不同了。

1951年初，我开始走上革命工作岗位，不仅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心情胸襟也起着变化。我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前途充满了光明、自由和幸福。昨日种种譬如死，今日种种犹如生。我把过去的伤痛深埋在心底，把保留下来的十几本《生死恋》包扎好收存在箱底。我愿以此作为分水岭，不回顾，只向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1952年我来到了北京。1954年参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工作。1957年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会中

央委员会机关任职。我勤勤恳恳地尽心工作，努力学习，积极改造，向前迈进。

转瞬到了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展开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红卫兵走上街头，有的人被他们用皮带抽打；有的人头发被他们剃掉了一半，留下一半，成了阴阳头；有的人被他们五花大绑押上卡车拉走，看起来形势十分紧张。我们宿舍楼里也有两户被抄家的，于是人心惶惶、坐卧不安。楼里每户人家都在门缝底下捡到一张有“属于地、富、反、坏、右、资的人，都必须到指定场所老实交待问题”等字样的印刷品。我想：我既不是这“六类分子”，历史上又无问题，自己心里有数。因此，在当时那种阵势下，虽然也有一种紧张感，却还没有到惊慌失措的地步。但在“横扫四旧”的浪潮中，几乎每家都这样：翻箱倒柜寻找有没有属于“四旧”的东西，有的话赶紧把它们处理掉，甚至家传珍藏的古旧书画都不敢保留。我家也不例外，书柜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外，其他书籍都拣了出来堆在一旁，准备当做废品去卖掉。为了小心起见，一些旧照片和信件等只好忍痛付诸一炬。这时，我当然想到了收存在箱底的十多本《生死恋》，心里不免犯起嘀咕来：这些解放前写的旧作，还能保留吗？万一被人发现了，污蔑为“黄色”小说，岂不给自己，给全家招来祸害？我还不被揪出来批斗吗？这么一想，不禁忧心忡忡。我考虑了好一阵子，狠了狠心，把一小捆《生死恋》从箱子底部翻出来。白天还不敢，等到夜阑人静，我一本本地把书的封面撕下、撕碎，把书芯也几页几页地拆散，混在其他旧书、旧报纸中捆扎起来，准备第二天一起处理掉。在我亲手把它撕下、撕碎、拆散的时候，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只感到心隐隐作痛，两只手也不停地哆嗦。“我这是在干什么啊？”我问自己。我自信：

我这本书只不过是写些两个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压迫、争取婚姻自主和一些不幸的遭遇而已；何况还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同情、鼓励和支持。这里面又没有“黄色”的内容，我怕什么？我干什么要自己亲手来毁掉它？当我拿起最后两本已撕去封面而书芯还是完整的《生死恋》时，忍不住两行眼泪滴落在书上，两只手僵住不动了。这终究是自己带着病花了四百来天的工夫倚在床上，背靠被子枕头，膝头上放了一块板，含着热泪一字一字写出来的啊！那里面蕴涵着我的真实感情，难道就这样把它消灭得无影无踪？我这样做，对得起九泉之下的惠民吗？对得起我们之间那真挚的感情吗？我反复地问自己，深深地叹着气！一种抗争的情绪在我的胸中汹涌着，压倒了我的犹豫和害怕，不！无论如何，这最后两本不能把它消灭掉，我得保存下来给孩子们留个纪念。我要冒一下风险把这两本虽然没有封面、但内容还是完整的书，找个最不易被发现的地方收藏起来。可是藏到哪里才最妥当、最安全呢，这确实是煞费苦心的一件事，我东想想、西想想，觉得哪儿也不妥当，哪儿也不保险……最后，总算想到了一个自认为是最安全的处所。

我选中了客厅北窗下写字台挡着的那排暖气片的后方。暖气片与墙壁之间略有些空隙，墙上还伸出一个托住暖气片的铁钩。于是，我把这两本书芯，分别用牛皮纸包封好，用一根又细又结实的绳子两端各系上一本。暖气片上原来就放有一块木板，是为了放置些常用的书籍、杂志、报纸和稿纸的。我把这些东西和木板先挪到写字台上，然后把紧挨着暖气片的写字台往外拉开，以便我进去方便操作；再把这根绳子居中放在铁钩上，那两本书便一边一本悬挂在暖气片与墙壁中间的空隙处了，距离地面大约有一尺高光景；然后我再把写字台又推回原处，紧靠暖气片挡着。这样，从外面是一点也看不出来

了；最后把木板和那些书报杂物等仍旧放回原处。这样，总算为它们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处所，如果不是有人知道底细，特意到暖气片后面去查找，一般人是想不到的，也轻易发现不了。做完这些，我的心似乎稍微踏实一些。再一看墙上的挂钟，已经是午夜一点了。但是，这一秘藏是否能够万无一失呢？那就很难说了。当然，红卫兵也未必就一定光临我家。但我想，万一来了，这起码是多了一道保险吧！就这样，这最后两本没有封面的初版《生死恋》总算被我隐藏、保存了下来！我的这番举动，在当时的形势下，可以说是冒着相当大的风险的。万一被人发现，肯定要被认为是“藏匿罪证、负隅顽抗”，那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文革”初期，《生死恋》并未给我带来灾祸。但是运动逐步进入高潮，机关里几位主要领导——主席、副主席、正副秘书长等早已靠了边，还有个别的中层负责干部也被揪出来了。到了1969年4月机关军管后，来了两位军代表：一位姓Z的四十岁左右，一位姓H的三十岁上下。初来伊始，Z代表便自我介绍：“我是土八路。”随后指向H代表，“他是我们部队里的秀才。”

军代表进驻后不久，就有人向军代表反映我写过“黄色小说”，是个“反动作家”。天哪！我虽然政治水平不高，但我自信：我写的绝不是“黄色小说”，我自己更不能算是“反动作家”……这些都是从何说起？运动刚开始时，我就有此顾虑，现在果然有人这样说了。

有一天，那位年纪较轻的H代表与我偶遇，便问我：

“听说你写过一本小说，是不是？”

我乍一听，未免觉得有点突兀。但我又不能否认，否认了，反而不好。我便老老实实在地回答他：

“是的。那是我在1946—1947年间写的。”

“写的是什么内容？”

“是写自己在封建家庭里受到旧礼教的压迫，为了争取婚姻自由而苦苦挣扎的那一段不幸的遭遇。”

“书还有吗？”

“……还有。”

“那你明天把书带来，行吗？”

我稍迟疑了一下，向他点了点头，接着说：

“不过——这是解放前写的一本旧作。我的文化不高，水平低，其中难免有许多失误……我诚恳地请您批评、指教。”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想：虽然我自信这本书谈不上是“黄色”的，但也担心别人将其污蔑为“黄色”的，我该怎么办？现在——果然有人向军代表作这样的反映了。幸亏我当时冒了冒险把最后两本书收藏了起来，否则，此刻我到哪儿去找啊？别人说你是黄色的，你说不是，又拿什么来证明呢？我纵然有口也难以申辩啊！

回家后，我把隐藏下来的两本《生死恋》翻了出来，一看，居然安然无恙。第二天，我拿了其中一本和我的其他作品、笔记等资料到机关一并交给了那位年轻的 H 代表，请他审阅。

书是交给军代表了，但我心里却忐忑不安起来。如果军代表看了以后，也认为是“黄色”的，那……等待我的不知是什么……？我横了横心，思想上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接受批斗甚或被打、被关……当时机关里有一位近六十岁，担任出纳的女同志，在军管前早已被一个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关在一间空屋子里被斗被打，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她曾自杀未遂。我想：说不定，我也将和她一样被关起来吧？但是我绝不会自杀！

可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动静。H 代表未再找我谈话，

我也未去找他。

有一次，H 代表召集群众开会，会议结束前，他不指名地讲过这么几句话：

“……我们批评某件事或某一作品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否则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看法。你说它是黄色小说，我说它是反封建，好比你和我坐在这桌子的两边看阿拉伯数字的‘6’，你看是‘9’，我看是‘6’，同样的道理。”

当时，我一边听着，一边心想：这岂不正是指我那本《生死恋》说的！我一方面有点暗自庆幸，觉得这位 H 代表还是很公正的，并未偏听偏信；另一方面就算他不是指的我那本书，但只要他有点见识，就说明也还是很有水平的。但到底是不是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呢，却不能肯定。

1969 年底，机关干部几乎全体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后来听说，那位年龄较轻的 H 代表已回部队了。机关里只剩下另一位年龄稍大的 Z 代表。我心里又在想：我交出去的那本《生死恋》和其他材料不知怎样了？到底是福是祸，心里老是忐忑不安！

1972 年，我在干校经常发低烧，因我年轻时右肺曾感染过结核，连里批准我回京检查治疗。

回京后不久，有一次，住在同一宿舍楼的 G 同志来找我，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封袋，说机关里的 Z 代表托他顺便带给我的。等 G 同志走后，我拆开封袋一看，原来就是我当初交给 H 代表的那本《生死恋》和其他材料。另外，还有一张纸是 H 代表写给 Z 代表的几句话：

这些材料在日后或“斗批改”完后拟交还本人或另当处理，

望裁决实施。最好将最后处理通知其本人，方可了结事之始末。特交接。

1970.10.22.

至此，这本险被诬蔑为“黄色小说”的《生死恋》总算是劫后余生，告一段落。

到了80年代初，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出现在面前。

浙江人民出版社费淑芬、李均生二位同志辗转托人打听到我的住址并找到我，说该社有将《生死恋》重新出版的考虑，特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先是感到震惊，没有想到这部旧作还有重见天日的可能；随之考虑到：说实话，限于我自己的文字水平，《生死恋》写得实在太肤浅。在20世纪80年代再来重版是否合适？但同时，我也想到：如果真能重版的话，岂不是恰恰证明了它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黄色小说”吗？对这本书来说也是一个“平反”的好机会。犹豫不决了好久，最终，我还是接受了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建议。

《生死恋》在1982年8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重版，后又转为浙江文艺出版社重印，到1994年共印了4次，印数高达432000册。这期间我接到国内19个省市的许多读者及国外读者的来信，这更是我始料不及的。我深知，自己的这个作品写得并不好，有时自己看看也觉得不满意。我这绝不是虚伪的矫饰之辞，而是我内心真实的反映。能有这许多读者来信，完全是出于读者的一片热诚。当我每次接到从出版社转来的读者来信时，和三十多年前初版出书接到读者来信时一样，总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信上反映出读者真挚的感

情，善良的心灵和人与人之间那种友好的、真诚的关系，这在今天是非常难得和宝贵的。

读者满腔热情地称呼我“大姐”、“阿姨”、“大妈”，也有叫“奶奶”的，等等。他们把关怀与爱护从各地遥寄给我。他们信赖我，愿意把自己的疑难、苦恼，甚至秘密告诉我，希望听取我的意见。我拿着信纸的手往往不由得微微发颤，泪水也在眼眶里打旋。我也曾反省：如果读者因看了《生死恋》而产生什么……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负面影响，我将引咎自责，以期弥补我的过失。反之，如果这本书对读者尚能起到些微好影响的话，总算聊以告慰于读者，自己也无愧于心了。

不少读者反映，由于种种原因——如高考落榜、失学、失业、失恋，或受着父母包办婚姻的束缚，或遭到病魔的折磨，受到经济的压力等等——曾经消极悲观、对生活失去信念，甚至想以一死了此残生，说“在读了《生死恋》后，从中得到了启发，并汲取了力量，打消了自杀之念”。有的说：“因为高考落榜而去死，实在太不应该也太没志气；现在认识到应该刻苦学习，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日后为‘四化’多作贡献。”有的说：“我曾受到和你同样痛苦的经历，为什么就此一蹶不振了呢？我应该醒悟过来，重新对待生活，要做一个生活的强者。”也有不少读者，从今昔对比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感想，说：“对新旧两种社会有了比较形象的认识和深刻的体会。”有的说：“《生死恋》是对旧社会、旧礼教的悲愤控诉，正是那个吃人不见血的封建意识和社会，造成了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不知扼杀了多少善良美好的心灵，摧残了多少纯洁可爱的生命！”还有读者说：“我虽生在旧社会，却在红旗下长大，享受着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优越条件，和书中男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对照，感到自己真是太幸福了。我们更要珍惜、保持这种幸福。”

读者提出这些认识与体会，反过来也给予我极大的鼓舞与鞭策。这不仅沟通了读者与作者的感情，也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使双方都能获得提高。

在很多读者的来信中，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如反映当前某些地区，某些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男女，仍旧被封建意识束缚着，享受不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新婚姻法》已经颁布多年，但父母包办的、变相的买卖婚姻还相当多；男女青年被迫自杀的惨剧还在发生；尤其是被换婚、被拐卖的女青年的遭遇更惨。她们为了反对这种压迫，为了争取自身应得的权利，有的被打得鼻青眼肿，有的甚至被逼疯……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封建余毒和旧习俗、旧传统的害人之深。这一方面固然需要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开展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以提高父母一代人的认识和觉悟，一方面也需要年青的一代要有坚韧的毅力、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去承受世俗的偏见以及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压力，才能冲破习惯势力和封建余毒的桎梏，去争取并保卫这种权利。好在今天的社会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革，又有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在保护着，虽然局部地区还有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总的说来，今天青年一代所过的幸福生活，比之当年我所受的痛苦遭遇，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除了信件，不少读者还附寄相片给我。有几位还到北京来看过我。如浙江平湖的蒋启韶，是一位爱好文学、擅长篆刻的青年。他常常给我来信，还刻了两枚名章和一枚闲章送给我。有一次，他要出国，到北京来办手续，知道我原籍也是平湖，他来京时竟不畏路途迢迢，提了两瓶家乡特产——平湖糟蛋送给我。我看着那已久违了的美味，真是盛情难却啊！

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吴艾玲，自己来不了，特地买了一盆梅花盆景，托她来北京的同学带来，说一定要找到我，把盆景送给我。我收到后，即去信感谢她的盛意。

还有新加坡的陈利成，遇到一个疑难问题，拿不定主意，来信希望我提供意见。我坦率地把我的分析和意见回信告诉他，他果然考虑了我的意见。1986年3月15日，这位热情的青年来中国旅游时特到北京来看我，并用随身带的相机为我拍了几张照片。

最近，嘉兴的读者陆明出差来京时，也很热情地来看过我。

这些青年（也有部分中老年）读者，都有着一颗纯洁善良的心灵和满腔的热情。他们的来信、来访、寄赠照片以及新年前寄来的一张张贺年卡，都使我深受感动。我每接到一封来信，再忙，也抽出时间立即写回信。有些读者和我还不止一次两次地通讯。这几百封来信，我都编了号，妥善地保存起来。这里，我不可能一一列举，仅举下面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沈阳的尹伟——一位时年29岁的女青年，看了《生死恋》后，写信到出版社打听我的住址想和我通讯，因一时尚未接到回信，她急不可待地又写信（并附了贴上邮票的空白信封）给北京市公安局去打听。公安局给她寄回信时说：“查无此人。”后来，她还是从出版社知道了我的确讯，后即写信给我，自1984年7月24日第一封来信起到现在，我们互相通信已达百封之多。她已前后7次到北京来看我。逢年过节还打个长途来问个好。后来，她提出来，一定要认我做干妈，我觉得实在愧不敢当。但在她一再要求下，盛情难却，我只好应承下来。每当我拆读她的信，“亲爱的妈妈”五个字映入眼帘时，心头总是热乎乎的。我除了自己的两个女儿外，又多了一个女儿，使我感到无限的喜悦与安慰。这是一种多么诚挚、多么亲切，

又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感情啊！

2010年9月，北京创美时代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许永总经理意外来访。言谈之间，他讲到在求学期间看过《生死恋》之后的深刻感触。工作以后，自己有幸加入出版界，更使他兴起了将《生死恋》再次出版的意愿。他还认为在目前这种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缺少真挚感情的社会状态中，像《生死恋》中男女主人公这样不以钱财、地位为婚姻的取舍标准，发乎人性真情的爱情观恰是目前年轻人容易忽视的，也是社会舆论应该主导提倡的。于是，我强撑年迈之体，勉力对内容作了适量的修订，以使一直以来我就认为幼稚肤浅的作品尽可能地丰满一些。同时，为了适合现代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在1982年版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并将作品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语法、标点错误进行了一次总清理。也算是在我有生之年，对自己即将飘流在世的这片羽毛作了最后的一次梳理吧。在此特地向许总经理和其他对此书再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朋友表示真挚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深深感谢其他关注过我、给我来信、送我照片并远道而来探视我的众多读者。使耄耋之年的我得以增添生命的活力，增强我与疾病抗争的勇气。历年来，还有很多读者来信热情地询问我后来的健康情况和个人的生活经历，也问及书中其他人物，如我的父亲、姐姐、弟弟、大宝贝、小宝贝后来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了？还有我的知心好友璧姐的情况，等等，不一而足。我只能在此告慰这些热情的读者，这只能是另一个故事才能展现的内容了。

林淑华

2011年元旦，时年92岁

重版自序

《生死恋》是我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旧作，写的是自己年轻时一些不幸的遭遇。它好像一场噩梦，虽然经过了三四十年，还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重现。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旧家庭里。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我苦苦挣扎了许多年，饱尝辛酸，受尽磨难。好不容易从封建势力下挣脱出来，而战争、疾病、死亡、贫困，又把我层层包围起来。面对这险恶的处境和沉重的打击，我的心头刻上难以磨灭的创伤，只觉得万念俱灰，前途茫茫。这时候，《伉俪》月刊编者吴好好先生建议我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书写出来。后来又在他的帮助下，把我在《伉俪》月刊上连载的《生死恋》出版了单行本。它从1948年初版至1950年共印了5次。每次重印，都会引起我痛苦的回忆。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期间，我身历新旧两种社会的巨大变革，目睹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在，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造成的那股顽强的恶势力，不知残害了多少的青年！正像徐惠民医生说的那样：

“‘礼教’这两个字虽然是无形的东西，但是它却残忍地吞噬了许多有为的年轻生命。”那是一个吃人不见血的社会！在那样黑暗、冷酷的年代里，青年人要想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求得光明、自由和幸福是多么难啊！徐医生的不幸去世和我自身所受的种种苦难，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变革。新的社会已经来临，旧的时代终究结束了。过去的这场噩梦，也就让它永远埋葬在心底吧。

不意去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两位同志来访，说该社有意将《生死恋》重版，征求我的意见。我思虑再三，犹豫不决。因为我考虑到这样一本幼稚肤浅的旧作，今天重新出版是否合适。同时，我不愿埋葬在心底的那场噩梦再一次在我脑际重现，再去尝受一次回忆的痛苦。

另一方面，我把自己过去的种种遭际与今天社会在恋爱、婚姻上反映出来的许多问题联想起来，感到旧时代的青年男女要想取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需要付出多么重的代价，作出多么大的牺牲；而这些，生活在80年代的青年（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是难以体会的。反过来说，我为今天已经获得这些权利的青年们感到幸福，同时觉得他（她）们应该珍惜并维护这些权利。有时看到社会上在十年内乱中形成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影响了某些青年，也看到在某些地区父母包办的变相的买卖婚姻还在发生，青年男女因而被迫丧生的惨剧也时有所闻，不禁感慨系之。这种现象，不由我不想到封建制度在中国统治了几千年，而解放才三十多年，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被推翻，封建意识却不是短时期、不是那么容易被肃清的。它不仅在老一代人的头脑中作祟，也或多或少侵蚀着年青的一代。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出版社同志经研究，认为今天重版《生死恋》还是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决定把它重新出版。我因有上述感慨，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但这终究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旧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要是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文学修养差，内容方面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甚至错误。我恳切地希望读者能给予指正。但为了保持历史旧貌，我没有把它修改；旧版上以前未经校出的一些错别字和漏字，趁这次重版机会作了改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还去访问了三十多年前曾为《生死恋》写过“读后感”的周振甫先生。周先生在那篇文章中不仅给予我很多鼓励，而且也指出了不足之处。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在解放前，周先生和我虽同在上海，解放后也都在北京，但因我没有途径得以认识周先生，所以无缘识荆。这次重版《生死恋》的责任编辑费淑芬同志把周先生的地址告诉了我，我正待专程拜访，却不期周先生先来找我而得以会面，这不仅使我感到荣幸却又深感不安。叙谈间，得知周先生与我还是平湖同乡，更是使我高兴极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而且，从周先生那里又打听到了吴好好先生的确讯。这是又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吴先生得知《生死恋》将重版，在抱病休养期间，不辞辛劳，为《生死恋》重写了纪念文字，更是使我感动，我谨在此表示谢意。

林淑华

1982年5月